

后殖民语境下的文化变迁： 侨乡城镇的近代化历程

邓毅

(广州大学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广东 广州 511442)

摘要:在后殖民理论的语境下,岭南侨乡城市与建筑的近代化历程可以从西方殖民者、本土政府和民间社会三个层面进行解读。以侨乡城镇为例,可以看出华侨和侨汇对“骑楼”建设的影响,殖民主义建筑风格的骑楼与传统乡土社会公共空间的融合共存这一现象是侨乡社会文化变迁的物质反映。从后殖民理论的角度,可以阐述这一建筑文化现象之下的社会动因。

关键词:后殖民语境;文化变迁;侨乡城镇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2008)04-0112-03

1840年鸦片战争及1842年《南京条约》开放五口通商,中国自此开启了近代化的历程。除了通商口岸等港埠城市开始被纳入世界经济的体系外,岭南沿海的乡土社会亦成为劳动力输出最为集中的地区。出洋的华人通过自由劳工、契约劳工这两种近代移民的主要方式以及随之发展的连锁式移民方式,逐渐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人群——华侨。归侨、侨眷人数的增加,海外华人与其故里的经济关系即侨汇资本的发展,不仅启动了岭南侨乡社会变迁的历程,也影响了城市乃至乡土社会空间营造的近代化实践。

源自英属海峡殖民地城市建设规范,被制度化成为一种热带殖民城市的空间文化形式的“骑楼”,被华人转化为类似中国店铺住宅“前店后屋”的空间使用形态,并随着殖民主义、官方推动、归侨及侨汇资本的作用,形成为岭南侨乡城镇特殊的建筑与街道空间类型,是城镇发展至某一特定阶段的产物与反映。

岭南近代城镇发展离不开华侨以及侨汇的力量。然而过往通史性质的中国近代建筑或城市研究对于殖民世界二元对抗结构的设定,只一般性地揭示殖民势力的话语压迫对中国传统建筑生存状态的影响,而作为民间具体运作机制的华侨以及侨汇的作用往往被忽略。从风格变迁的角度研究近代建筑的总体特征,有时不足以说明动态的建筑文化变迁过程,特别是百余年来华、洋政治、经济、文化冲突背景下的复杂变迁。

人类学研究的视角以及文化研究的领域的成果,尤其是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理论,可以作为“近代建筑与城市”研究方法的参考,应用于殖民城市与殖民建筑的课题。

首先,人类学所掌握的微观结构与小进程研究为处理整体性认知与局部研究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参考。对于人类学研究而言,人类学家并不试图通过一个(数个)社区或个案的微观研究作出整体性的推论,然而小型单位的地方和个案分析完全可以作为探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因为借此我们能够从生活和民众的视角认识和解释现象的本质。换言之,对于“侨乡城镇”这样的“地域性建筑”课题,只有投入更多的力量,从地方史角度,从基层社会的“生活世界”中寻求其发展的原因及轨迹,才能使解释增加自身的说服力。

再者,奠基于欧洲殖民主义历史和制度实践,以及所有殖民地人民对这些实践的反应之上的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可以转化为建筑学领域研究殖民城市与殖民建筑及相关问题的方法。重要的理论如安东尼·葛兰西的“话语霸权”——关于“统治”与“认同”的权力话语理论,弗朗兹·法依(Fantz Fanon)提出的殖民主义背景下民族主义发展的三阶段说,以及霍米·巴巴(H. K. Bhabha)针对殖民地人民的异化,用心理学术语“矛盾心理”分析在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彼此吸引又互相排斥的一种非常复杂的混合性心理特征等等。从他们的研究可知,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关系经常不是简单的二元对抗关系。

收稿日期:2008-05-14

作者简介:邓毅(1974—),男,湖南桂阳人,广州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讲师,建筑学博士。

在后殖民理论的语境下,重新审视那一段殖民时期所遗留下来的城市与建筑,如果从主导力量——人的主观作用角度出发,以后殖民理论为依据,侨乡城市与建筑的近代化历程研究实际可由以下几个层面展开。

1.西方殖民者透过西方近代城市规划、城市管理策略建构殖民城市或租借地、外人居留地,成为与中国传统城市并列的异质的示范区域。这些物化的实体实际上是殖民主义从军事上征服了本土统治阶层之后,试图建立起隶属自己的地方和精神的归宿,同时又对本土传统逐渐颠覆,从而从边缘话语的层面跃升为主流话语的实践结果。

2.本土政府面对殖民城市的刺激作用以及城市发展的实际需求,逐渐转化为推动城市变迁的自发性动力及主导力量之一,开始进行近代城市的建构。这种空间实践不仅局限于开埠城市,近代许多城市的“拆城筑路”、“市政改良”运动都明显带有传统城市新旧嬗变的印记。

3.华侨阶层对殖民城市文化的认同,借侨汇经济的力量触动城市、集镇、市墟乃至乡土社会的社会变迁与实质空间变迁,即殖民话语引入的异质空间形式被逐步纳入到广阔的乡土社会空间生产和运行的机制,一方面彰显了华人宗族社会的伦理与价值观,一方面表现为西方殖民文化形式的模仿与接纳。

一、侨乡城镇的近代化

作为城市发展至某一特定阶段的产物,对以“骑楼”建设为主要内容的侨乡城镇空间演变的解读亦同样可以从以上三个方面展开。前两个方面的研究颇多,本文着重讨论第三方面,即华侨和侨汇对侨乡城镇建设的影响和其深层次原因。

从民国2年(1912年)制定的《广东省城警察厅现行取缔建筑章程及施行细则》开始,骑楼被政府推广到市区主要的商业街区,作为改善城市空间的一种手段与方法。此后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广州市区各商业发达地段基本完成了骑楼的建设。广州都市改良的成功,鼓舞了省内其他城市的“市政改良”,许多城镇如江门、开平、台山、汕头、中山等地,均根据广州的城市发展模式与经验,成立官方或半官方、半商会的组织来推动开辟马路、兴建骑楼街道的工作。其他地区如潮州、佛山、开平、恩平、新会等市镇,也在20~30年代这一波都市改革的风潮中,陆续风起云涌地推动骑楼建设。从清末开始至20世纪30年代,经由各地方政府推动的市政改良,骑楼政策可谓自省城广州逐渐在多个地方城镇实行。每个城镇仅仅用了短短几年时间,城市形态与城市面貌为之一新。

值得注意的是,这50年左右的时间,同样也是华侨实力开始显现,侨汇逐渐成为侨乡城镇建设的重要动力,侨乡社会发生深刻变革,侨乡城镇集居形态的发展时期。

由华侨力量主导的侨乡城镇形态的转变,有以下几个方面:(1)19世纪90年代末以后华侨新社区的出现。这些社区一般都位于交通便利的新区,如广东江门五邑的海外华人及当地富商于19世纪末纷纷成立地产公司,购买江门近郊的鱼塘桑基之地,填沙造地,划分地段,规划房屋大小、高度、走向,卖给同姓或同乡的海外亲戚作建房之用。以同一风格的建筑式样,同样的楼房高度,形成一个个华侨新村,如端芬镇附近的模范村,台城城南的模范村。(2)因铁路发展起来的新社

区。新宁铁路通车之后,沿线地区建筑业一片繁荣,三合地区的20多个华侨新村,其中不少是这一时期修筑的。(3)因市场交易活跃、商业繁盛而发展起来的墟镇。除五邑的各县城外,台山的斗山、公益,开平的赤坎、塘口,新会的古井、沙堆,恩平的江洲等墟镇兴旺起来。由华侨投资经营以侨眷为主要顾客的金山庄、钱庄、金银铺、布匹百货店、杂货店、酒楼饭店、建筑材料店鳞次栉比,相当繁荣。

骑楼也正是在官方改造城镇、市墟与华侨自发建镇造圩运动中进一步得以在广阔的乡土社会中推广的。

台山公益镇的建设便是源自华侨造镇。旅美归侨伍于政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在家乡经商的伍于政有感常年越潭江至对岸水口圩经商不便,遂召集地方绅士及华侨成立“埠务公所”,开始印发地段契据,四方招商建埠。次年5月,适逢民营铁路——新宁铁路动工修筑。伍于政等人多次与新宁铁路的创办者陈宜禧商谈,争取新宁铁路途经公益并设车站,故新宁铁路第一期工程改为公益至斗山段,铁路公司还投资20多万元,建筑公益路分局大楼、机器厂、停车场、电灯厂、码头、长堤等项目,吸引了大批华侨落户投资,加速了建埠进程。公益镇的规划建设直接受到了美国方格形城市规划的影响,美国方格形商业街区与已在海峡殖民地城市发展成熟的商住两用建筑——骑楼相结合的模式,被认为是适应于城镇商业发展的理想形式,故而“旅美华侨,熟知家乡建埠,心情激奋,遂集纽约市建筑图式之精华,绘制图纸”,将公益埠骑楼街道布局为垂直相交的网格形。

从光绪三十二年(1906)起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仅3年时间就实现了河滩变大埠,将公益建成为台山第二大墟镇。建埠完成后的公益埠里,自西向东的横街南华街、维新街、中兴街、苏杭街、长乐街、海房街与由南向北的直街上海街、上环街、中环街、下环街、东华街呈规整的方格网布置。横街作为商业经营的主要街道,逐渐形成了经营范围相近的专业街市,如中兴街集中了金融业,而苏杭街以经营丝绸、纺织品为主。横街与直街均为开间大致相等的二层骑楼。

公益镇是国内较早以民间——华侨的力量,透过有秩序、有系统的规划方式相互约定建设起来的颇具规模的近代骑楼城镇的。在这小小的土地上,还规划有公园、学校、医馆、教堂等公共建筑,地下水道也是预先铺设的,因此公益埠基本具备了近代商业城镇的要素。

华侨推动传统墟集的骑楼化改造及新的骑楼墟市建设,是侨乡社会空间地景变迁的又一主要内容。大量介于城镇和农民居民点之间的聚落形式——墟市的营建,将骑楼发展推行至乡土社会。

端芬镇汀江圩就是由当地梅姓华侨以及侨属侨眷创建的市墟。端芬镇大同河旁原本已有供商品交易的大同市,20世纪20年代末,居住在大同市的梁姓、阮姓出于宗族利益,杜绝附近的梅氏到市上买卖,激发了梅氏海内外乡亲自行建墟,墟址毗邻大同市东侧,大同河旁。时任培根小学校长的侨属梅健行被推举主理筹建,他和同族的梅炳然、梅忠儒共同筹划建设。汀江圩于1932年建成,占地80亩,100多幢二、三层的骑楼街屋沿长方形周边排列,整齐划一,中间留有长214米、宽28米专供商贩摆卖商品的空地,俨如一座大型院落,故汀江

圩又成为“梅家大院”。四周的骑楼,以商业经营的店铺居多,现能证实的以“堂”、“号”、“记”、“祥”为名的商铺就有33家,间有少量单纯居住的“户”。不论是商铺或住宅,都为宽度3米的占有1至3个开间的骑楼建筑。

交通便利,方便商业贸易往来的公路、河道旁及两者交汇处,是墟市发展的首选地段。如大同河上游距汀江圩仅1.3公里的西廓圩,由梁姓华侨宗亲修建,采取的方式也是骑楼店铺围合中心空地的布局方式,在规模上逊于汀江圩。再如台城至开平三埠镇公路与紫霞河交会处的园山仔圩,是1928年由当地旅美谭姓华侨用侨汇兴建骑楼宽度2.6米的商铺与自住房,采取的仍然是骑楼沿矩形周边布置的方法。

20世纪20年代台海(台山至广海)公路的建成通车则刺激了上泽河旁上泽圩的繁荣,并引发上泽侨居美国、古巴、南洋的陈氏宗亲开始对这个元朝中后期就已经存在的墟集进行改造。临近上泽河的住宅统一改建为商住两用的骑楼,骑楼街道于靠近台海公路处放大为8.4米×12.4米的集市贸易区。可见这种骑楼街屋围合形成墟市是当时墟市新建或改造的常见办法。作为一种贸易墟集,它的规模还无法形成像公益埠那样的集镇。它的布局方式满足了传统乡土社会宗族关系在近代逐渐转化为一种以商业贸易为主的经济与利益共同体的需要。

二、后殖民语境下的现象解读

上述关于侨乡城镇集居形态的转变,以及骑楼在乡土社会的推广,最终成为一种分布广泛的地域性城镇与建筑样式,即殖民主义建筑风格的骑楼与传统乡土社会公共空间的融合共存,这一现象可称为侨乡社会的“泛骑楼化”。侨乡社会“泛骑楼化”的现象,是侨乡社会文化变迁的物质反映,从后殖民理论的角度来看,殖民主义所引发的“族裔散居”与“精英”阶层的出现是不可忽视的内在原因。

“族裔散居”带来了侨汇这一城镇建设的经济基础,“精英”阶层的出现决定了城镇建设中的价值取向——向新的、先进的东西学习,而侨乡传统的乡土社会文化也对城镇的建设产生了影响。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以上几种因素相互作用产生了今天我们所见的这种“泛骑楼化”现象。

人们从他们的家乡自愿或被迫地迁移是殖民过程中的一个中心历史事实,“族裔散居”是指某个种族出于外界力量或自我选择而分散居住的情况^[1]。散居的族裔身在海外,一方面生活在所居处的社会文化结构中,一方面还残存着原乡集体的记忆。“族裔散居”给侨乡传统宗族关系带来的最深刻的变化就是家族成员长时间并不集中生活在一个明确且固定的地理范畴,他们主要靠经济力量维系海内外家族成员和原乡家族的关系。这种关系的转变是海外宗族关系的延伸,也使得侨乡家族相对淡化大家庭、宗族的结构,成为一种经济共同体。因此,造镇兴墟运动的基础——侨汇的使用,正是基于这种经济共同体的关系,一部分作为赡养家庭之用,一部分应用于赚取利润的资本运作,更有华侨将传统光宗耀祖的观念延伸为跨村的乡社认同,用之实现实业救国的理想及捐献于社会启蒙教育与慈善领域,成为侨乡社会近代化的推动力量。广东华侨投资最为集中的地方是广州、汕头、江门、台山、海口和梅县

几个侨乡中心,且广府地区的华侨投资几乎占全省华侨投资的60%。广东华侨投资的重点依次为房地产业、商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等,房地产业投资占去一半以上。

故而,侨汇带动房地产业是骑楼建设的重要物质基础。另一方面,相似的墟市形态——窄开间大进深的商住两用骑楼围合中心市场的布局方法,恰也符合了这种侨乡社会血缘共同体与经济共同体的复合关系,因为在宗族社会里,占有与支配的关系是产生矛盾的根源,面对市场,用均质化的空间划分方法是一个大家族共同生活在一个墟市的绝好办法。可以这么说,“族裔散居”透过侨汇经济力量维持了近代侨乡的各种社会运作,包括巩固了传统的宗法伦理,当然也挑战了源自农业生产的旧的社会价值观。

“族裔散居”和侨乡社会文化变迁互为因果,但归结起来,殖民主义是二者共同的原因。因为殖民者来到殖民地,他们的文化对土著来说是某种新鲜的东西,当两种不同的文化被历史并置在一起的时候,双方都从对方不同的文化形式中看到新的东西。由此,文化即在这样的过程中采取渐变、发现、发明或传播的形式发生变迁。殖民主义所导致的文化变迁的重要结果之一就是新的主体——来自第三世界但游离于第一、第二世界边缘的人及他们当中的“精英”的产生。他们反过来通过殖民主义发现或发明的东西影响、推动着殖民的进程。面对文化乃至建筑文化的选择,他们存在着这样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他们来自本民族的文化,另一方面,他们在和西方殖民建筑文化全面接触的过程中,又感受到了西方建筑文化在很多方面的先进性,故而努力地西方建筑文化中去谋求可能有助于本土建筑文化发展的元素。所以,“骑楼”是复合的建筑文化形式之表现:从单体上来看,是传统“竹筒屋”平面与殖民外廊式建筑、西方折中主义建筑样式的混合体;从墟市平面布局方式上看,是传统市集与骑楼建筑的混合;在城市市政改良中,源自海峡殖民地建筑规范的文化形式影响了清末至20世纪30年代的城市商业街区的建筑形态,成为一种重要的阶段性建筑样式。这表明了,受殖民文化影响的精英阶层(甚至可以由华侨扩大到官员阶层)一边模仿殖民建筑的形式,包括规则、话语等,一边出于自己脚下的土地和本能的反映,在前者的基础上作出变异和综合的努力。

选择在后殖民语境中解读侨乡近代城镇的发展及“骑楼”现象,其叙述对象从建筑、城市物质本体上升为文化现象,叙述视角转换为创造者——人,叙述的层面扩展到国家——地方政府——乡土社会,解读的结果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看到建筑文化变迁现象之下的社会动因。环视亚洲诸国的“近代建筑”,它们无不与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历史有关。希望这一方法的尝试,能对近代殖民城市和殖民建筑的研究有所裨益。

参考文献:

- [1]张京媛.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 王献福

(E-mail:sheke@public.zz.ha.cn)